

西安小学:从初小到完小之路

□何美红

上世纪初,在张謇先生引领下,通州乡间兴起办学热潮,一批乡村洋学堂(当年百姓对新式学校的俗称)应运而生,西安小学便是其中之一。从1905年创办初等小学到增设高级部发展成为完全小学,西安小学的每一步都历经艰难,其创办历程值得铭记。

下图左起:民国初年,泛舟西湖的吴思慎、吴浦云父子(右二、三);《通州题名录》中的吴思慎;青年严德滋;1929年7月,刊于《南通报》头版的西安小学招收高级部新生广告;1930年8月,《通光日报》有关西安小学高级部迁至本部的报道。



废庙兴学,张謇助力创初小

张謇自首创通州师范后,即倡导各区广设小学,俾使学龄儿童求学有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西安乡绅吴思慎、姜萼楼、徐咏沂、王廉卿等发起创办新学。他们效仿张謇废庙兴学之举,议就西安镇北,改祖师殿东侧配殿文昌宫(原文昌宫南魁星楼仍保留)之屋三楹,建初等小学一所。继由知州王仁东(王世襄之祖父)委吴思慎执掌校事,“爰迁神象,葺为教室,接待室及厨房夫役等室。复辟敞厅为教室,玻璃黑板课桌形式,悉遵新法。又为祖师殿别建厨房、厕屋于庙西,担土填于校东,经营两月,共耗银一千二百余元”。学校由此建成,并于次年二月初二正式开课(1914年张謇主持编印《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所记创校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西安初等小学建办之初即定“忠实”为校训,并于校门两侧书“忠则无私 实则不欺”解释其义。

吴思慎(—1942),字冠民,号翼之,初习儒学,为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秀才,次年与白雅雨同期入南菁书院求学,后潜心于医道,在通城、金沙等处设诊所,为南通儿科名医,张謇与时任县长宋涤尘等人曾撰联赞其医术精湛。因热心教育,1928年与严德滋同月获聘为第四区(西安区)教育款产委员会委员。

然而,西安小学的创办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曾遇诸多困难。经费方面,开办费除学务公所津贴50元、得捐款300余元外,不足部分均由吴思慎一人“挪垫借贷”。据吴回忆,由于还款无着,“其办学校之亏欠困之成讼”。但就在他因众人“冷眼旁观,不加赞助”而心灰意冷之时,竟得“张謇翁津贴学校开办费(银圆)五十元”。办学常费经呈请州署拨茶庵殿、袁观音堂庙田二万余步作学田,以租息充学校常费,不足部分设法另筹。后因庙田而起纠纷,与王一山、许乐山等结讼于通海五属学务公所,议长孙敬民竟贊成学田收归寺庙。吴思慎为此“曾直白于张謇舟中”,令孙“见之面赤”,“自忿而自掌颊”,终使“茶庵殿二万五千步田(按:约合百亩)……犹属第一校”。故张謇病逝,吴思慎曾致挽联,表达哀思与崇敬。当年招生,也十分困难。因风气未开,洋学堂并不能被乡民接受,故虽经多方劝导,到正式开学时仍仅有学生20

人。此外,因改庙为校,故阻挠质疑尤多。除唆使庙僧呈控州署,谋收回庙田,还有屡唆宵小,夜窃校物者。而难民过境,照例借宿于庙中,竟有人引导至吴思慎家中,肆意骚扰。办学之艰难,可以想见。

筹设高小,屡挫屡进待破茧

1915年,西安初小遵照部章改名“南通县四市立第一国民小学”。当年西安,只有初等小学,毕业升学需去通城等地。现有史料表明,最晚在1916年,当地就已设立高小的计划。这一年,时任西安教育会会长严德滋主持召开常年大会,会上由西安市董事许乐山“提议开办高等小学校案”。报载当年“该区已成立小学十一校,……(毕业生)富者可以送考他区,而贫者无资以培植,必致辍学向隅。许市董提议及此,经各热心教育家一致赞成,尤望该校早日成立,则莘莘学子受惠无穷”。并认为“整顿教育为目前之要政,而开办高等小学尤为西安教育上之急务”。为便于民众子弟继续就读,地方人士开始接力筹办高小。

1919年,“因该市国民学校已有十四处,理合开办高等小学”。市董王秉国“邀本市各要人集董事办事处筹议进行方法。除向各殷富及各商家募助外,拟向乡农每自田一万步募捐足洋六元”。会上,“众皆踊跃,乐于输助”,同时还规划了基础,并闻“不日即可鸠工兴筑”。

也是在这一年,有“西安市第一国民学校四年生,毕业后,苦于升学无资,其父兄向该校教职员商议。教职员以办高小校成立在即,遂组织特设补习班”。如此为学生着想,赢得社会赞誉。

但高小设立计划未能如期实现,以至“西安市小学林立,……惟初等毕业求学各生,均赴南通、金沙各高小,肄业颇为不便”。1920年1月,吴浦云拟就《西安市自治区自治事业计划草案》,其中包括设立高校等计划。此事也引起了官方重视。同年5月,县长瞿鸿宾莅临西安,“至第一国民校舍规划高等小学校地基,以备兴建”。

1921年,西安区入学人数进一步增加。据是年8月《张孝若论江苏省义务教育书》载,当时的西安学龄儿童达5884人,已就学数1282人,占比21.8%(全县平均值为21%),在全县21个市乡中,入学比例排名第九。设立高级小学,

适应学童就近升学之需更为迫切。

1923年春,因施行新学制,西安第一国民校改称“西安市第一初级小学”。同时,西安、刘桥、兴仁等九市乡“由劝学所决定分年设立高级小学,以宏造就”。县教育行政会议确定每区应设一完全小学后,西安地方人士再次行动,积极推进高小创立。是年6月,该区第二校(即徐桥小学)一校董“与各市董筹商,拟就市立第一国民校添置教室,为高等学校,并主持募捐,以便进行”。次年4月,西安董事办事处召开会议,其中有“筹办高级小学案”。议决:先由市董向各殷富劝认开办费用,俟开办费稍有把握即行兴办”。

1926年11月,西安市议事会议长王达荣、副议长王福熙“呈送《西安市筹办公立小学校议决案》一件,并附核算书,……所呈概算书,估计建筑、设备等费共银一万四千余元”。县知事翟照章核复,并转县教育局,认为“该市地面广阔,初级小学生众多”,有筹办完全小学之必要,进而要求“责局长查照办理”。随后,教育局派员试学汤逸凡“于阴历十二月十九日前往该市,勘察校地,并就所拟概算书详加审核,复局呈县”。然而,又因战乱与经费等原因,直到1927年北伐军抵通之前,西安小学高级部的设立仍未实现。

时局新机,合力推进终落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通经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西安高小的设立再次提上日程。1928年6月,成立不久的西安市行政局(相当于区公所)召开局务会议,讨论“筹办公立小学校案”。议决:就本市第一校改建。其房舍计划及经费预算,定于日内拟具完全,呈请备案”。随即于7月由“严疆、严德滋、周一仁等”函告县教育局,拟添办西安小学高级部。

教育局同意后,西安方面即刻行动。7月27日,西安市行政局邀集地方人士及各小学校长20余人,集议筹办公立小学校。会议由时任西安小学校长严德滋主席,票选五人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开办一切工作,并由该会向久安公司董事会及救济团,暂借久安空屋为校舍,先行办理招生开学,其开办经费预算三百余元,由行政局各小学校长及热心教育人士分别负担”,同时“拟定章程,积

极进行”。

1928年9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西安小学高级部终于在位于镇南的原久安纱厂厂区南部平房中如期开课,解决了西安地区初小学生升学就读不便问题,同时改校名为“南通县西安市小学”。

严志达,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8年刚好在西安姜氏私立小学读完初小,一度曾为升学至何处就读而发愁的他,由此成为其父严德滋积极推动创办的西安小学高级部首批学生。在久安厂教室里,严志达度过了他两年的高小生活。据其传记记载,西安“高小顺利建成,并且所聘请的校长、教师都很认真负责,图书设备也相当不错,于是严志达得以就近入学”。

西安小学高级部的设立,离不开时任校长严德滋与地方贤达吴浦云。该校建校三十周年时,众人讲话及“严德滋所作创办高级之报告”……(对吴浦云)热心协助创办高级一致表示赞许”。

高小设立后,西安小学办学经费仍部分来源于学田租,如吴浦云曾参与“在西安校与(王)希农、(孙)季康(按:时任校长)、(徐)国光与各校佃户谈判,一方催缴旧欠,一方换新契约”。1930年5月,“西安小学请将学校所存草荡顶首一百十元拨充开办费”,经县教育局“局务会议讨论,议决令该校将此项存款先行送局,然后呈请动支”。另一部分则来自财政拨款。以县教育局公布的1929年每月《教育经费收支账略》为例,1月“支西安市小学高级部395元,初级部205.916元”;3月“支西安市小学高级部129元,初级部63元”;4月“支西安市小学高级部100元”。可见当时的初、高级两部仍为独立核算。

1930年夏,因防务需要,南通县第六区(即西安区)区长袁少初“向久安厂各发起人恩借房屋,得发起人等允许”。8月3日,吴浦云“至区公所晤严德滋,谈西安小学校舍迁移问题,均同意,即高级部迁往区公所旧址,区公所及保卫团迁往久安厂内”。

8月5日,区公所迁入厂内办公。随后,在新任校长邢淑秋(女)主持下,原设在久安厂屋的“小学高级部移于旧区公所(按:位于已经西扩的初小北侧城隍庙)内,恰与该小学初级部前后连接,于教管方面殊为便利,诚一举两得焉”。两部虽有隔墙,但有门相通,高级部从此并入本部。西安小学虽在2009年7月与韬奋小学合并后更名,但该校校址120年来从未改变。

张謇与曹顶

□鞠晓君

张謇对曹顶的纪念实践,既延续了他“博物馆为教育”的理念,又在民族危机中体现了他以文化救赎唤醒民族的初心。通过文本再造、空间重塑和跨国传播,张謇将地方英雄纳入民族国家叙事,形成文化记忆与民族想象的“共生环”。曹顶从“切面义士”到“民族公魂”的蜕变,昭示了地方文化资源在现代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角色。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同年10月,张謇因父丧离京丁忧,归乡之际恰逢清军于平壤、黄海接连溃败。双重危机(家族伦理与民族存亡)的交织,使其直面传统士大夫“忠孝两全”叙事的崩塌。

1895年2月,张謇受张之洞委派总办“通海团练”,试图以民兵抵御日军南侵。然而,团练因组织松散、装备落后而成效有限。这一挫败促使张謇转向文化动员,他在《通海劝防歌》中嵌入曹顶事迹,以“白死还作无用鬼,不如生做有用士”的呐喊,将忠君思想转化为现代民族意识,并重构生死观,提出“死有重于泰山”,赋予平民参与民族救亡的合法性。

《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后,团练解散,张謇痛感传统军事体系的腐朽。1903年赴日考察,既惊叹明治维新的现代性成就,亦警惕日本扩张野心。归国后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理念,大力创办企业和学校,并着手将曹顶塑造为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符号。

曹顶原为明嘉靖年间的盐民义勇军领袖,《万历通州志》载其“率盐丁拒倭,力战殉国”。民间传说中,其形象兼具“切面铡刀斩倭”的草根特质与“歿后显

圣封神”的神秘色彩。张謇通过田野调查重构其生平,刻意淡化“显灵护城”等神异叙事,转而强调“匹夫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平民性。他利用地方志中“州人称顶为长城”的记载,将曹顶的“匹夫报国”精神与“平民教育”理念相勾连,使其成为现代民族意识的象征。

1921年曹公祠重建完工后,在张謇和费范九先生的感召下,梁启超、金泽荣、韩国钧等44位各界名人为英雄曹顶题咏,加之《大风》《战时民众》《东南日报》《通州日报》《青年文艺》等全国媒体杂志的报道,更使曹顶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全国性符号。

张謇为曹公祠题写“匹夫犹忠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公”楹联,将“公”的伦理从儒家士大夫扩展至平民烈士,重构“天下为公”的现代诠释。

张謇利用拓宽城山之路,改扩建年久失修的曹义勇祠,考虑到曹顶墓位于城山河东侧而曹义勇祠位于城山河西侧,民间百姓每逢宗教节日都要到曹义勇祠拜祭,很少有人去曹顶墓扫墓的现实,张謇决定将曹顶的墓与祠堂合并在曹顶墓移至曹公祠前,这样老百姓就可以一并祭拜和扫墓了;张謇派自己的亲信、曹家后人曹文麟先生办理具体寻墓

和移墓事宜,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曹文麟寻墓未果。当时曹义勇祠位于城山路中央,门前恰好有一修路备用沙石堆,张謇于是安排人以沙石堆为基,用石块垒砌起曹顶墓,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曹顶墓,并在墓上立“立马横刀”塑像(改切面铡刀为青龙偃月刀)。门廊采用拱券、石柱等西式元素,隐喻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型。

根据民间传说,张謇将明代嘉靖时期的遗留在烽火台改建为“倭子坟”,并寄予“葬倭五百”的胜利叙事,并在“倭子坟”顶部建京观亭。按《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京观”本为震憾敌国的战利品陈列,张謇借此将民间传说转化为“历史实证”。

倭子坟通过“京观”仪式固化集体记忆,曹公祠的中西融合建筑象征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曹顶雕像则以视觉力量传递抗争意志。

张謇通过“京观”仪式固化集体记忆,曹公祠的中西融合建筑象征传统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曹顶雕像则以视觉力量传递抗争意志。

张謇决定将曹顶的墓与祠堂合并在曹顶墓移至曹公祠前,这样老百姓就可以一并祭拜和扫墓了;张謇派自己的亲信、曹家后人曹文麟先生办理具体寻墓

和移墓事宜,但由于战乱等原因,曹文麟寻墓未果。当时曹义勇祠位于城山路中央,门前恰好有一修路备用沙石堆,张謇于是安排人以沙石堆为基,用石块垒砌起曹顶墓,也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曹顶墓,并在墓上立“立马横刀”塑像(改切面铡刀为青龙偃月刀)。门廊采用拱券、石柱等西式元素,隐喻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型。

南通抗日民谣拾遗

□严金凤

1938年3月17日(农历戊寅年二月十六),日本板垣师团5000余日寇从姚港登陆,侵占南通,直到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江海儿女拿起刀枪抗击日寇的同时,还用歌谣等形式来痛斥日本侵略者,揭露其滔天罪行。新中国成立后,我经过数十年的搜集与积累,整理了其中一部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特把其中一小部分奉献给读者。

乡梓民谣

我出生于市郊闻西圩塘村,今年89岁了。记得七八岁时,邻居家姐姐凌凌荷(其兄为新四军战士)就教我说顺口溜。那个辰光,正值日本鬼子投降,荷姐姐教我唱的有:“盒子枪,黄狗子(日本鬼子)下了乡,先捉鸡子后追花姑娘。机关枪连打三响,兑板(相差)一枪,怎么打炮小东洋。”“日寇上岸闹空防,黄狗溜来黑狗(伪军)吭(叫),二月十六(农历)南通陷,杀人放火民遭殃。四哥(老百姓对新四军的尊称)合到要动手,不怕鬼子钢炮响,一天起码弄两擦(两次战斗)。鬼子最怕台子脚(老百姓对新四军的又一昵称,比喻新四军是一张台子的四根脚),老鼠见猫成王八。”

荷姐不识字但记忆力特别强,还教了我跟她哥哥学的数字民谣:“一二三,打得鬼子没处躲(躲);二三四,鬼子挨打好几次;三四五,打得鬼子连叫苦;四五六,炸毁鬼子警察局;五六七,鬼子到处都碰壁;六七八,打得鬼子没办法;七八九,打得鬼子没处躲;八九十,消灭鬼子细瘟贼。”后来,进步私塾先生也教了我一些,让我刻骨铭心。

1952年,我考进大生纱厂当工人,凭自己的小学文化基础,热心于搜集地方民俗民歌。

抗战时期,南通打鬼子队伍中有个小头头叫陆炳侯,在攻打驻扎南通城的鬼子时,因汉奸陈二侯告密,他牺牲在西城门口,于是有民谣:“陆炳侯,家住尖沟头,先做‘土匪’,后当游击队,两次攻城,死在城门口,一条性命害在陈二侯。”

“鱼丝港,新出大队长,先有草上飞,后有乔志钢;张强队伍站在高岸上,二区区长王振刚;三区区长叫李芳,李芳辞职交于施百昌,刘桥区长宋祖望,与彦明文道一淘(起)绑在桑树上,不曾枪毙被刺刀上,他的上级本是梁灵光。”这是一位叫钱汉文的老人回忆中的叙事民谣。歌颂新四军游击队的还有一首:“二月十六(农历)南通陷,鬼子汉奸下了乡;四哥哥(新四军)本领高,不怕日本鬼有刺刀;日本候下乡来烧杀,就怕遇上台子脚(新四军);四哥哥队伍一出发,日本候躲进碉堡当王八;四哥哥胆大到处跑,日本候像老鼠见了猫。”

《吹开乌云见青天》与《枯木逢春开颜笑》,既描写新四军英勇杀敌,又展现军民鱼水情,是这样唱的:“新四军显神威,杀敌如风把云吹。吹开乌云见青天,吹得鬼子化成灰。”“枯木逢春开颜笑,新四军来到赵高桥。百姓犹如饥孩见了娘,老少好比旱鸭下了水,欢迎队伍一大溜(群),敲锣打鼓三天不睡觉。”

工人心声

1926年,大生纱厂就成立了南通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唐闸地区组织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在抗战中,唐闸工人不仅参加浴血奋战,还用顺口溜、民谣等形式参与战斗,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抗日歌谣。

《火烧十里坊》:“花夹子(棉花包)还在码头上,扇子(情报员)已经到后方,花船行驶到十里坊,四脚子(新四军)合起来都搬光,气得鬼子发了狂,一把大火烧掉十里坊。”迄今留下了方言歇后语“十里坊失火——一趟措”,这首民谣说的是工人与新四军团结起来与日寇作斗争,把日军从外地运来的棉花抢运到抗日根据地,日本鬼子为发泄烧掉十里坊一带的民房。

“拿魔窟”是日本鬼子雇用的工头。这些狗仗鬼势的工头残酷欺压工人,工人恨之入骨,便称他们是“拿魔窟”。不知哪位工人编了首顺口溜“拿魔窟一跑(到车间走一走),心里如火烧,只恨身上没把刀,剁他一记(下)气才消。”

民谣《争口气》:“小工要得争口气,志要坚心要齐,拉起手来站一起,馒头不蒸争口气。”小工是指在纺织车间里的勤杂工,专为挡车工做辅助工作。这些人比操作工还要低一等,受工头的气更多。